

精神与日月同辉

1982年3月,上海红十字会率先在全国开展遗体捐献工作。2001年3月1日,全国第一部有关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——《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》正式施行。35年来,上海红十字会、遗体捐献者联谊会、高等院校、上海福寿园等相关单位和团体紧密合作,致力帮助捐献者献出最后一份爱,为这些平凡的人完成了一件不平凡的事。截至2016年底,上海累计登记遗体捐献和角膜捐献44106人,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;累计实现捐献9573人,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。遗体捐献,这个曾经讳莫如深的话题,正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,并付诸行动。

2002年3月,全国第一座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在上海福寿园落成。纪念碑的主碑由一块近2米高的透明玻璃构成,上面刻有红十字会的会标以及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纪事;碑前横卧着的大理石上,刻着上海市原副市长谢丽娟的题词“精神与日月同辉,爱心与天地共存”;两侧一男一女人体镂空雕像,则寓意“人道、博爱、奉献”。主碑的周围,是三座同样近2米高的书型石碑,数千名遗体捐献实现者的名字被镌刻在上面。

福寿园办公室主任廖财明介绍说:“这几年,遗体捐献者的队伍在不断壮大,从刚开始的几年才能写满一本‘书’,到现在一年已经写满一本‘书’了。这是好现象,因为遗体捐献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,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。”目前,“石书”上已载有包括上海市第七届政协主席、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和上海市红十字会原会长白备伍等在内的6000多名捐献者的名字,年龄最大的110岁,最小的出生仅2个月。在这些捐献者中,流传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。

遗体捐献:爱心与天地共存(上)

◆ 韩建刚

遗体捐献,这个曾经讳莫如深的话题,如今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。截至去年底,上海累计登记遗体捐献和角膜捐献者44106人,约占全国三分之一,累计实现捐献9573人,约占全国三分之二。捐献者年龄最大的110岁,最小的仅出生2个月,他们用身体献出了最后的爱。



医学院的学生在解剖课前向“大体老师”默哀致敬

的故事。

一人捐献带动一个家族

蒋百平是嘉定区娄塘地区生前办理遗体捐献的第一人。他年轻时因病丧失了劳动能力,曾对弟弟说:“我对社会贡献不大,死后想将遗体捐献给医疗科学机构,这比火化要更有价值。”1986年底,蒋百平将一份《遗体捐献登记表》摊开在弟弟蒋乃平的眼前,让他在登记表的“执行人”一栏里签了字。1993年6月,蒋百平逝世后,当时的上海医科大学接收了他的遗体,用于医学研究。

现在,蒋百平的家族中已有17人在嘉定区红十字会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。他的外甥女金莹是嘉定区遗体捐献登记者联谊会嘉定工业区组长,主要负责宣传、组织和售后服务工作。金莹说:“现在人类对许多

疾病仍束手无策,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,意义重大,我很愿意为此奔走!”提起家族中第一个捐献遗体的蒋百平,金莹话语里充满敬意:“我很佩服大舅舅,他很勇敢。现在,家里有不少人都受他的影响,加入了遗体捐献的队伍,包括我的父母和小舅舅。”

2008年,当金莹从报纸上得知中国遗体捐献者少、缺口很大时,就对女儿表示想在去世后捐献遗体。女儿一听就哭了,说什么也不同意。金莹耐心地向女儿解释:“人去世后就没感觉了,不会觉得痛,你不用心疼妈妈。妈妈捐献了遗体,让医学院的学生多划几刀、多做些研究,他们当医生后,病人就可以少受点痛苦。”金莹承认,捐献遗体的决定,的确让她受到了一些压力。在农村,人们的观念相对保守,误以为捐献遗体不吉利,或子女不孝顺,甚至有人

猜想捐献遗体会不会有什么好处。面对猜疑,金莹只是笑笑,说:“没有的事,你再说也不会有,网上一查就知道遗体捐献是无偿的。而孝顺父母要在生前。人死后还能为社会作出点贡献,这是好事情。”最后,金莹在得到家属的理解和支持后,毅然走进嘉定区红十字会,办妥了遗体捐献手续。

我问:“遗体捐献后能保留骨灰吗?”“当然可以,家属如果要保留骨灰,遗体使用完毕火化后会把骨灰交给家属。”她回答。让金莹感到欣慰的是,在她的带动下,自己的丈夫、弟弟和弟媳、小叔子、表妹等都加入了遗体捐献登记的行列。

金莹一直在为扩大捐献者队伍而忙碌。在她的努力下,嘉定工业区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已从2013年的29人增加到了现在的64人。2015年端午节前夕,金莹得知70多岁的张忠

兴老人在病床上表示想捐献遗体,她马上联系区红十字会,当天就赶去为老人办理手续,第二天便将遗体捐献证书送到了张忠兴的手里。老人在弥留之际,紧紧握着金莹的手,轻声说了句“谢谢”。

可喜的是,奉献者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。2016年2月,媒体报道了蒋百平家族争献大爱的事迹,而金莹一家也被选为全国最美家庭之一。

“大体老师”照亮求医之路

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解剖中心,遗体捐献实现者被学生们又称为“大体老师”。每堂解剖课前,师生们都会对“大体老师”默哀一分钟,并每人献上一支菊花,以表敬意。而在每年清明节前,师生们也都会在本校和福寿园举行感恩缅怀仪式。

医学院的解剖室里,终年散发着福尔马林的气味。那天,老师掀开盖在解剖台上“大体老师”身上的白布,是一位老伯平静而苍白的脸。在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的一堂解剖课上,8个身穿白大褂、戴着口罩的学生正围绕着遗体,准备开始解剖。解剖室里很安静,只有手术器械放入托盘时的清脆碰撞声。这位“大体老师”将陪伴学生2个月,为他们提供一次难得的、允许犯错的实验机会。

受传统习俗的影响,中国目前捐献遗体者人数并不多。在上海,平均每8名医学生才分配到一具遗体实习,而西方国家培养一名医生需要10具遗体。一具遗体的用处很多,能做器官和角膜移植,能给大医院解剖教研室当“大体老师”,能做病理解剖分析实验,能制作人体标本。一个医学院学生在笔记上曾写下这样一句话:“大体老师,您用生命中最后一束光,照亮了我们求医的道路。”

玄机无界



达世新

33.有何联系

“忻飞去德国显然不是旅游,是与他航空航天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。他先是从上海直飞法兰克福,待了两天,你看。”马葛亮边说边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小圆圈,标上所说的地名。然后由此拉出一条线,随着他的叙说,这线的延伸线上依次出现了相关地名。“接着他去了西面不太远的亚琛,又到了北面的佩内明德,然后回到法兰克福,请注意,他没有从法兰克福飞回上海,而是坐车向南,去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,随后再飞回国内。”马葛亮说到这里直视钟波达。“这路线呈现一个往右下拉的圆弧形,对一个钱款不多的高校毕业生来说,他为什么要绕这样的圈子?”

钟波达盯着行程路线,真像个大问号啊!显然这行程路线比前时尤子奇讲的更详尽,所提的问题也更敏锐。他思索着回答:“他要去的对他来讲无疑是很重要的,我猜想,他去法兰克福因为那里不仅是德国和欧洲的国际空港和重要中转站,还因在二战中遭受过盟军的猛烈空袭而差点毁灭,就在法兰克福的东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,据说发现了过去纳粹研制的早期隐形飞机,那飞翼式样子跟现在美军的B2很相像。”

“我们找到了他在那里考察的照片。”马葛亮又从笔记本里取出了相关的照片。

钟波达很惊讶他怎么弄到这照片的?!

马葛亮往咖啡里加了一包黄糖,用棒子搅拌着,悠然说道:“他去佩内明德是去考察V2导弹的遗址,忻飞显然对处于时代前沿的东西特别有兴趣。那么,他为什么要去亚琛和布达佩斯呢?难道那里也有尖端飞行器?”

钟波达想我可不能输给你这个军龄比我短的小马啊!他竭力思考起来,忻飞为什么去布达佩斯?这问题尤子奇也提起过,可现在又多了个亚琛,这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?呵,他陡然想起了,那两个地名在过去做我国航天之父钱学森节目时曾见到过。“那是‘航空航天时代科学奇才’的家乡和重要工作地啊!”

“是吗?那奇才名叫什么?”马葛亮刚咬了一口三明治便放下了。

“冯,冯……”“冯·布劳恩?”马葛亮接口说出一个名字。“不,你别误导我。”钟波达微笑着摇摇头。“他叫冯·卡门!”“哈哈,我是这两天才知道这个名字的,他是世界顶级航空航天专家,钱学森的老师,他在美国创建的‘古根海姆实验室’,领导了两代科学家和工程师闯进科技的前沿领域,有‘现代达芬奇’之称!”

说着,马葛亮的脸色又严峻起来。“接下来我说个你肯定不知道的情况吧,忻飞就在又回到法兰克福时,在街上发生了一次车祸。”“哦,有这样的事?伤得怎样?”

“不严重,确切地说只是被车右侧擦碰了下,车主很负责把他送进一家私人诊所,免费治疗和休养了两天。”马葛亮举起了桌上的照片,“主治医生就是此人,汉斯。”

钟波达细细看了一眼,等待马葛亮的下文。他说:“此事看上去很普通很正常。然而,就在不久前德国警方对一名恐怖分子住宅的突袭中,搜到了一份有关忻飞的医学检查报告。但这报告并不是关于忻飞伤情的,而是他的智商智力与脑部检查的综合分析报告。报告认为,忻飞有着极高的智商和非凡创造力,并预测他主持科研项目的成功率有96%。”

“唔!”钟波达大为震惊,这意味着汉斯是与恐怖分子一伙的。马葛亮喝光了杯里的咖啡:“但德国警方要确定他为恐怖分子还缺乏足够的证据,他有着良好的社会形象,还常来中国做医疗仪器的买卖。”

钟波达心里咯噔一声,国际恐怖组织实际上已比他们更早地关注忻飞!关注他的新型无人机!

马葛亮站了起来:“你可以拍一张此人的照片,以便注意下忻飞周围是否有他的身影,他和他的组织可能是我们难对付的暗中对手,或者是对手之一!”

芷江。一座造型别致的民族风情木塔从车窗外闪过。

13.正中我下怀

“老李,你醒醒。”“什么?”爸爸迷迷糊糊回了一句。“有没有闻到煤气味?”妈妈轻轻推了推爸爸。“没有啊!有吗?”“啊!”妈妈一声尖叫,像一道闪电划破宁静的早晨。“老李,快起来!老鼠,老鼠!”

我忍不住偷笑,再也没有比这声尖叫更悦耳、更动听的声音了。离计划成功似乎近了一步。虽然细菌战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,但化学战的影响似乎正在发酵,心理战的作用尚有待评估。

爸爸冷静地处理完死老鼠,然后到厨房里去折腾了。妈妈出门买早饭去了。“晓军,起来了!”妈妈一边往餐桌上摆大饼、油条,一边喊道。“哦!”晓军缓缓探出被子,伸了一个懒腰。“怎么样?”妈妈转头,担心地问厨房里的爸爸。

爸爸站直身子,眉头仍旧皱着:“看了半天,好像没什么问题。”“奇怪,早上我好像确实闻到煤气味了。”妈妈仍有疑惑。“应该没事。”但爸爸的语气不那么坚决。“安全第一,还是报修吧!”

上午我去一趟房管所,你管你上班。”妈妈这句话,我听得真切,不禁有些激动。

OK,正中我下怀。我必须赶往辽宁西路了,离9点还有不到两个小时,得抓抓紧。我一直认为,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,未雨绸缪总是好的,早一点到现场,就能早一点作准备。没有在闹市区耽误哪怕片刻,也没有在漾亭桥上停留一分钟,更没有往西湖公园里瞥上一眼,脑海里只有只有行程路线图。

当然,起初步履还是轻快的,心情也是轻松的,但走着走着就都沉重起来。似乎有些恍惚,更多或是紧张,猫步越来越乱,毕竟离现场是越来越近了,毕竟这是一场血战啊!丝毫没有感到初冬的寒意,我的血液在沸腾。

储蓄所就在跟前,就在路边,两扇铁门,门面不大,百米开外就是滨外的校门。选好观察哨位置,监视程序启动。目测发现,两名女员工先后进入储蓄所。一名三十岁不到的样子,来得早些,从包里取出钥匙,打开铁栅栏上的挂锁,再打开里面的木门,进去后关上了木门;另一名四十岁左右,稍晚三五分钟到达,在木门外敲了敲,里面的人开门后,她也

走了进去,然后木门又关上了。没到营业时间,多少有些准备工作。

年轻的应该就是沈翠真,如果里面没有其他人,情况似乎复杂了,两名员工,另一位会不会也有危险?马路上大车小车载夹着一波波快速流过,自行车三五成群从眼前穿过,路边来来去去的行人也不少,风平浪静,波澜不惊,应该跟平常没什么两样。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滨海,人是多的,城市的脚步是快的。

储蓄所开始营业了,木门已经打开,可不知是沈翠真还是她的同伴开的门。我好像有点走神,不应该的。好在单冬宝还没到,没有骑人停留在门口。我长吁了一口气。

进出储蓄所的人不多,十来分钟里也就三个,都是上了年纪的人。此刻,里面应该只有两位客户,都是老太,那个老头已经离开。我打算先等单冬宝来,把反面人物的特征观察仔细,千万不能认错人,以免打错靶子。辨认准确,敲定对象以后,再趁人多眼杂的时候溜进去,钻进柜台,找到核按钮,找准时机摁响警报。所有这些都尽快完成,越早报警,就越有可能为后面的行动争取时间。

想起很多电影中,特种部队或防暴小组行动前对表的镜头,每个人都抬起手腕,神情专注地盯着手表,此时镜头中是飞速跳动的电子表液晶屏特写。然后队长发出低沉的声音:“现在对表,现在是……”哇,好紧张、好英勇的样子。

纲领是行动的先导,手中有粮,才能心中不慌,算无遗策,才能大功告成。首选方案当然是预警逼退单冬宝,如果做不到,那次选方案就是阻止柜员报警,避免刺激罪犯行凶杀人。今天,我既要做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张子房,也要当血染征袍、无与争锋的赵子龙。

目标出现。他骑车不快,缓缓而来,但停车锁钥匙的动作却十分利落。他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,抬头扫了一眼储蓄所的招牌,又迅速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左右路边,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凤凰牌香烟,一个煤油打火机,抽出一支烟叼在嘴里,然后点上。

现场

周

取

